

貴陽志資料研究

内部刊物

第一期

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版

目 录

《贵阳府志》简述·····	史继忠 (1)
贵阳城垣的变迁·····	何静梧 (3)
贵阳暴雨小志·····	屠玉麟 (7)
大坝子高家花园 (怡园)	
——解放前中共贵州省工委的一个重要活动点·····	尹克恂 (13)
基督教贵阳中华圣公会史略·····	杜光炎 (16)
阿訇王静斋事略·····	保健行 (20)
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概述·····	曾庆贤 (21)
贵阳丝线业·····	刘道行 (23)
花溪公社大寨大队布依族社会情况调查·····	姜永兴 (27)
《鸿雪因缘图记》中的贵阳名胜·····	刘 锦 (31)
《香草园日记选》序·····	李独清 (34)
王履升行书及其诗作·····	王萼华 (39)
贵阳志编纂委员会征集资料启事·····	贵阳志编纂委员会 (41)
编者的话·····	(43)

贵阳志编纂委员会编

地址：贵阳市中华中路市政协大楼四楼
电话 24078

《贵阳府志》简述

史 继 忠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贵州巡抚江东之撰成《贵阳图考》二十八卷，这是贵阳地区第一部方志专著，可惜书早亡佚，清人已不得见，惟《明史·艺文志》有著录。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贵阳皆无专志，故道光年间所修的《贵阳府志》实为仅存的一部贵阳地方志。

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隆盛时期，全国各地所修方志达四、五千部之多，然称精善者不过百余部，《贵阳府志》即在其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誉之为府志中的佳作。

《贵阳府志》创修于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几经易手，历时九年，于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成书，二年（一八五二年）七月刊行问世。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江西泰和人、庚辰进士、翰林院编修周作楫（字小湖），调补贵阳知府，汲汲以修志自任，并得巡抚贺长龄等赞助，在籍之显官绅耆朱荫堂、杨竺圃、孔叙五等人皆解囊捐金共助其事。次年，设志局于府学明伦堂（其地在今团结巷内）之右，以思南府人、前任江西新城县知县肖琯（字玉成）为修纂，博采旁搜，网罗旧闻，历寒暑而无间，阅三年而草具大略。书已成帙，然贺、周犹以“择而未精”、“美而未善”，复聘邹汉勋主纂，重加考订（邹汉勋，字淑绩，湖南新化县人，举人出身，流寓贵州，长于史才，其所修纂的方志，除《贵阳府志》外，尚有《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均为后人所称道）。汉勋任事后，修志之业益宏，以蔡璜、邹汉章任分纂，翟煜观等六十四人分任校定、校对、采访、督刊。汉勋在旧稿的基础上，去复删繁，另标节目，据经史以辟异说，缘考证而定篇章。工竣之时，贺长龄、周作楫已离任他去。王成璐继任贵阳知府，踵成其事，将全书刊行。

《贵阳府志》为通纪体。其纪事上起壮柯、夜郎，下迄修志之日，叙述了贵阳地方上下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制度因革的概况。从全书的内容和结构看，重点仍在清代，体现了“详今而略古”的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大约志中有关清代以前的资料，多系文献辑录，间有论证，亦多“以书考书”，不尽完全可信。清代的资料则大都经过实地采访、考察，有较大的可靠性。

不言而喻，该志的记事范围是清代的贵阳府。当时的贵阳府除府的亲辖地而外，尚领有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今开阳县）、定番州（今惠水县）、广顺州（今长顺县）及罗斛厅（今罗甸县）等州县。贵阳府亲辖地包括内城四保、外城四保、蔡家关里、麦西里、水边里、巴香里及中曹正司、中曹副司、白纳正司、白纳副司、青岩土弁、养龙长官司等地。贵筑县辖十七里，即：东上里、东下里、南上里、南下里、西上里、西下里、北上里、北下里、谷上里、谷下里、洪边里、喇平里、光明里。贵阳府亲辖地的八保、四里、六土司及贵筑县所辖十七里，其间除养龙司而外，基本上均在今天的贵阳市辖区之内。

《贵阳府志》凡一百一十卷，二千九百五十二页，约一百一十六万字。全书分为冠编，正编和余编三部分。冠编二卷，题作“恭录”，专录康熙四十四年至嘉庆六年这段期间有关贵州的诏令。正编八十八卷，其内容为一记（大事记），三表（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六图记（疆里图记、山水图记、城廓图记、宫室图记、关路津梁图记、古城池图记），七略（分星略、五行略、祠祀略、学校略、食货略、武备略、艺文略），三政绩录（汉元政绩录、明政绩录、清政绩录）、四传（明耆老传、清耆老传、烈女传、土司传）。余编二十卷，前十八卷为文征，末二卷为杂谈。文征内容有敕、教、议、赋、考、记、序、墓表、诗等。杂谈则专录琐事。其体例与章学诚“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的主张相符。

方志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保存资料。准此相衡，《贵阳府志》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志书。在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贵阳的历史文献中，当推此书最为详备。诸如建置沿革，疆里四至，山川河流，土物特产，乡里名人，典章制度，军事设施，政事得失，文教兴废，无不备载。如道光年间，贵阳城的一百二十三条街巷，三十三座桥梁，二十余处官署，二十多座寺庙，城外九百个村寨，四十二条道路，八十六座桥梁，近三百所寺庙，其名称、方位、沿革等，均有清楚的记述。我们初步复查，绝大部分准确无误。该志对贵阳的经济情况，也颇为留意，不仅记载了各处的人口、户数、田亩、赋役、经费、驿政、钱法、盐政，而且对各种农产也有详细记录。例如稻谷即录有红粳（红粘）、白粳（白粘）、羊毛粘、紫茎粘、黑糯、毛糯、红谷糯、牛毛糯、老鸦糯、早稻、晚稻等品种，杂粮、蔬菜、瓜果、花草、药材、鸟兽、鱼虾等，也尽收无遗。该志所征引的史籍甚广，凡当时能得到的书籍都加以利用。《艺文志》中著录了（万历）《贵州通志》、（崇祯）《贵州通志》、（嘉靖）《贵阳府志》等五十多种，多数现已佚亡的书籍。文征中辑录了大量诗文，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元）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碑记》等七十余篇碑记及田雯等人的十六篇奏议，还有近百个诗人的作品。在政绩录、耆老传、烈女传中，记述了数百历史人物的事迹。是研究贵阳府属各

州、县的重要资料。总之《贵阳府志》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极富参考价值。

邹汉勋作志，好疑古，能不拘泥于历史旧说而独抒己见，表现了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许多杂凑成篇的方志大异其趣。但是对许多年代久远，文献不足，难于定论的史实，他往往强作解释，结果往往失之穿凿，不免流于主观臆断。如邹氏断言，罗甸国在“今罗斛及贞丰、册亨、兴义、普安、安顺府西普定废路”，这实际是缺乏可靠史料依据的，主观夸大了罗甸国境域的论断。邹氏又称：“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矩州是否即今贵阳，这里姑且不论，然“土人讹矩为贵”宋太祖以此将矩州改名贵州一节，却无文献可征，立论难以服人。又邹氏在沿革表中称“今州，即今竹，今广顺也”。注云：“《唐书地理志》令州，《宋史》绍庆府羁縻州，《九域志》作今州。当以今为正，令者涉笔之讹。《元史、地理志》管番民总管有金竹府。”然详查唐、宋、元、明四代史籍，《唐书》《宋史》所列羁縻州“令州”“今州”之下皆无注释，元、明有关金筑府的记载又不言金筑即古之今州，可知“当以今为正”和“今州即金竹”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在志中不乏其例。但这些缺点对全书来说，仅是局部的，无损于全书价值。只要我们科学地加以分析，去其粗而取其精，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以及地名普查工作、历史研究工作、文物保护工作，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贵 阳 城 垣 的 变 迁

何静梧

(一)

元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叙述元军初到贵阳时的情况说：“入我国土，军徇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据此可知，宋代，今贵阳地区属于“贵州”，元军占领后，才改名“顺元”，在元军未到前就有城了。这是迄今为止较为可信的关于贵阳城的最早记载。

元代的贵阳城，史书多称为顺元城。由于年代久远，对顺元城我们今天已无法全面考证，仅从地方志书的记载中知道一个梗概。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谯楼，在治城内宣化坊北，即元故城北门之址，本朝

拓城而北，楼废。”

明白圭《钟鼓楼记》：“……钟鼓楼未建前，都知监太监深水郑公忠作镇于兹，历十五年，是为成化癸巳，公于暇日访求故老，知其故址于城之北隅正街，盖自前元尝为顺元都元帅府所建土城楼，国初展其城于今北门，而陵彝其废址，世远人亡，无以考其沿革。……”

明郭子章《黔记》：“国初建贵州省城，率因元旧城，址狭隘，城垣卑薄。”

清《贵阳府志》：“贵阳府城即元顺元城也。顺元旧设土城，东、西、南三面与今城同，北面仅至今钟鼓楼。”

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元朝顺元城是一座土城，城址狭小，城墙不厚。它的范围，北面到钟鼓楼（钟鼓楼在王家巷口，即今之勇烈路口），东面至今之老东门，西面至今之大西门，南面至今之大南门。其位置在现在市区南部，大部分属于今南明区。明初的贵州省城，就是在顺元城的基础上拓建的。

（二）

明朝曾经两次大规模兴建贵阳城，形成了后来贵阳城的格局。

第一次大规模兴建是在洪武年间。有关此次兴建的记载如下：

1. “司城围九里，周建五门，东曰武胜，南曰朝京，西曰圣泉，北曰柔远，次南曰德化，皆镇远侯顾成、指挥马烨因前元故城而拓建者也。”（（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

2. “省城，洪武五年，镇远侯顾成、都指挥马烨建，甃以石，门五：东曰武胜，二卫共守之；南曰朝京，次南曰德化，城楼三，城舖二十三，水关一，长七百六十丈，贵州卫守之；西曰圣泉，北曰柔远，城楼二，转角楼一，城舖一十七，水关一，长六百一十二丈，前卫守之。西南临河，东北有池。”（（嘉靖）《贵州通志》卷四）

3. “贵州省城，洪武五年，都指挥马烨筑，共一千三百零九丈六尺五寸，高二丈二尺，基宽二丈，垛口共二千二百四十三个，城门楼阁共六座五门，小月楼共一十五座，水关二座，城舖共四十七座。”（郭子章《黔记》卷之四）

4. “贵阳府城即省城，明洪武十五年，都司马烨建，石城周围九里七分，高二丈二尺，门五：东曰昭文，南曰迎恩，西南曰广济，西曰振武，北曰布德。东北有池，西南一带滨河。”（（康熙）《贵州通志》卷之第八）

从上述记载来看，建城时间有两说：一说建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一说建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谁正谁误？查《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又查《明史·顾成传》，顾成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才调守贵州。因此，可证建城时间应为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当系脱

字之误。上述四条资料都说有五个城门，但明代志书与清代志书记载的城门称谓不同，清代志书记载的当是改名后的城门名称，时间较晚。后来这五座城门，东面的俗称老东门，南面的俗称大南门，西南面的俗称次南门，西面的俗称大西门，北面的俗称北门。

此次建城是在元朝顺元城的基础上扩建，北面已抵今喷水池。不仅城墙改为石砌，而且还修建了城门、月楼、水关等设施，其规模和坚固性远非顺元城可比。一般人称这座城为老城或内城。

第二次大规模兴建是在明末天启年间。洪武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贵阳城已日感狭小。到了明中叶，贵阳城北门外居民逐渐聚集，普定街（今黔灵西路）、仁寿街（今黔灵东路化龙桥一带）等街道次第形成。万历年间，播州杨应龙起事，多次扬言要渡乌江，直逼省城，北关外的居民奔沓入城，贵阳城内人多为患，巡抚郭子章曾疏请仿效广州、扬州，筑贵阳外城，但未有结果。天启初，贵州发生奢（奢崇明）、安（安邦彦）之乱，贵阳城曾一度被围达十一月之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既出于防守，又出于居民增加的实际需要，明王朝中央政府决定修筑贵阳外城。

（康熙）《贵州通志》和（乾隆）《贵州通志》都有修建贵阳外城的记载，以后者较详。（乾隆）《贵州通志》说：“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总督张鹤鸣、巡抚王穉于北门外增砌外城六百余丈，设威清、六广、洪边、小东四门。”称威清门，是因为从此门出可通威清卫（即今之清镇县。清镇系由威清、镇西二卫取一字合称得名），威清门俗称为威西门；称六广门，是因为从此门出，可通修文六广河，这条路是明代贵阳通水西的要道；称洪边门，是因为从此门出，可通洪边十二马头（即今之开阳县）；称小东门，是因为次于内城之东门，小东门俗名新东门。由于外城建筑时间较晚，俗称新城。

经过洪武和天启年间两次兴建，贵阳城垣已全部建成。它包括内城和外城两部分，中间以北门相通，共有九个城门（即老东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北门、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新东门）。它的形状，南北长，东西短，如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它的范围，包括了今贵阳市环城路以内地区。

（三）

明清两代对贵阳城垣进行过多次修葺。内城建成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都御使王缉增女墙数尺，城下开路建桥，以便夜巡。十三年（公元1585年），都御使舒应龙因拦马墙卑甚，且善崩，乃砌以石脚二尺，上筑墙，高可五尺许。”（郭子章《黔记》）“（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予（按：指郭子章）于二水关傍效北关制筑二虚台，以护水门。”（同前书）“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重修，增高三

尺。”（（康熙）《贵州通志》）

明末，孙可望毁外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总督甘文焜复修外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巡抚何世璜、十年（公元1732年）巡抚张广泗、元展成前后修葺。”

（（乾隆）《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总督张广泗请帑改建外城为石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补修内城东隅三尺。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补修内城西隅七尺。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动帑项补修南门垛口九丈。十九年（公元1814年），补修西门城身、垛口二十余丈。二十年（公元1815年），地震，东门裂者四十余丈，皆补修焉。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二年（公元1822年），补修南隅九丈。三年（公元1823年），补修外城新东、六广、洪边等门，凑合十余丈。十一年（公元1831年），南隅为水所圯者十余丈。二十年（公元1840年），西北隅自圯者数处，皆报部补修。”

（《贵阳府志》）“迄于咸丰中，因苗乱四起，新城低塌，复加修补。光绪初年，官绅商民等又捐资重修，全甃以石，增高五尺，计长八百二十丈。其旧城坍塌者，均为补葺。”（文宗瀚《贵阳乡土地理》）

辛亥革命后，由于现代武器的广泛使用，城堡在军事防守上的意义已不大，反而有碍于城市交通。从此，贵阳城垣进入了逐渐撤弃的时期。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老城北门城楼西南角，由于年久失修，受雨水冲刷而倾塌。当时，周西成主黔政，正创修城内马路，省政府遂命撤弃，并将老城北门一带隔离新城的城墙一律尽撤，这是贵阳撤城之始。周西成死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十月，政府在已撤老城北门月城原址，建一高约一米、直径五十余米的圆台，环以石栏，向东、南、西、北方向各开一门，筑台阶数级以通上下。台之正中央，筑一高约五米的像座，其上立一身着西服、面南站立的周西成铜像，以后这里便名“铜象台”。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铜象台撤毁，修建了花圃和喷泉，这就是现在称为“喷水池”的地方。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当时政府修建大西、威清、六广各门穹洞，撤去各城门上的谯楼，改修碉堡。同年，又在大西门侧另辟一门，称中山门。于是，由城内之中山公园前可过门直达金锁桥。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撤除大南门月城，辟为广场，以利交通。又封闭原南门，在其侧另辟一门，名为中正门，由此可直达铜象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今中山路东段，从小十字起修建马路，在原老城东门侧将城墙拆开一口，正对东山，使中山路延伸，一直接通环城马路。至此，老城之西门、南门、东门虽仍有门，但已非原来的城门。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二月四日，日本飞机袭击贵阳，炸毁市街十余条，死者数千人。以后，为便于疏散，在乐群路、世杰路、飞山街、指月塘、沙锅寨、郭家湾等处分别

撤除城墙若干段。短短的时间内，贵阳城的出口处增加不少。

抗日战争后期，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长时，市政府命令撤除城墙，标价变卖城墙石块，又将城基卖给人民建筑住宅。杨森的亲信官员借此中饱私囊者不乏其人。至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贵阳城便只剩断垣残壁了。

贵 阳 暴 雨 小 志

屠 玉 麟

暴雨是指在短时间内下降的雨量大、强度大的降水。强大的暴雨常造成洪涝灾害。洪水淹没农田菜地，冲毁屋舍道路，流失大量田土。尤其对于河流两岸的居民房屋，低凹河谷的农田，山坡的梯土、梯田危害极大，给工农业生产及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影响。现就贵阳的暴雨资料进行初步整理，报导如下。

（一）

贵阳历史上暴雨成灾、毁屋溺民的情景时有记载：

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夏，贵州省城大水，霁虹桥圯。”（《贵阳府志》）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夏五月，贵阳大水，漂没民庐舍，溺死者八十余人。”（康熙《贵州通志》四十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夏五月，贵阳大水，贵阳水溢，衢市舟行。”（民国《贵州通志》一一七卷、（《贵阳府志》八八卷）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五月十三、四等日，大雨连绵，山水骤发，省城地低，溪河宣泄不及，于十五日黎明，水决外城而入，冲击北门内外，滨河居住兵民六百五十户，淹毙大小男妇一百六十八名。”（清实录高宗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六月二十七日大雨，田禾尽赤。”（《贵阳府志》）

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八月，贵阳大雨。”（《贵阳府志》）同年“八月大雨，二十四日始止。”（《清史稿》）

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夏五月，贵筑……等处大水。十五日夜贵筑大雨水，没

甲秀楼之半，坏庐舍及浮玉桥。巡抚嵩溥先发谷赈之而后奏。”（民国《贵州通志》一七七卷）

《贵阳府志》八八卷则记：“五月十五日夜，贵阳大雨。南明河溢，上及甲秀楼之半，濒河庐舍多倾。二十一日夜中复大雨，即恒雨也”。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四月初九日起至月晦，连日大雨，中间时霁不过数日。山水涨发，转运艰阻，米粮不能到营。”（民国《贵州通志》）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大雨始于六月二十八日晨三时，止于晨十时，共计降六十七点二公厘。二十八日下午稍霁，晚九时后复淫雨霏霏，直到天明。昼间屡停屡降，或密或疏，南明河水泛滥，两岸田亩水深三、四尺，变成灾害。”（《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淫雨成灾，筑市连日淫雨，溪河泛滥。威西门、头桥、河滨突受山洪暴发，七月十日下午，该地附近居民竟发生被水冲毙达十余人之惨剧。”（《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六月二十七日，雷电交加，市空风声鹤唳，一刹那间使环筑四周山洪暴发，好象黄河决堤似的，市若干地区洪流急喘，水深及膝，横断市面南北约九华里的贯城河一时浪涛汹涌，沿河民房几有被席卷而去之势。”（《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等等。

自明代以来，贵阳发生暴雨成灾的记录仅编入《贵州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中的，就有三十余条。

（二）

现代，由于具有详尽的气象观测及完整的记录，故通常根据降水量的大小来作为划分暴雨的标准。一般把在24小时内降水量等于或大于50毫米的降雨称为暴雨。

根据贵阳的气象观测记录，日降水量等于或大于50毫米的暴雨在贵阳一般并不多见。从1921年至1980年的六十年中，贵阳记录到的暴雨共计161天，平均每年有暴雨2.7天。暴雨最多的年份共有暴雨8天，仅有一年，即1934年；一年中发生暴雨7天的有1926年和1954年；最少的全年无一天暴雨，如1936、1941、1944、1955、1966、1975等年，而多数年份降暴雨2—3天（见表1、）

表1· 年降暴雨日数频率 (%)

年降暴雨 日数 频 率	0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年 数	6	9	16	13	8	5	0	2	1	60
占总年数的%	10	15	26.7	21.7	13.3	8.3	0	3.3	1.7	100

暴雨主要由季风气候造成。在夏半年，控制贵州地区的主要气流为来自东南的太平洋与来自西南的印度洋之暖湿空气。所以贵阳暴雨发生的时间，均从每年三月起至十月止。最早出现的暴雨是3月18日（1955年），最晚的则在10月23日（1961年），从11月至次年2月，则不发生暴雨。在3—10月这段时间，又以每年5~8月出现暴雨的频率最大。六十年中，在6月发生的暴雨共计45次，占总暴雨次数的28%，其次是7月，发生暴雨35次，占总次数的21.7%（见表2、图1、）。

表2· 六十年中贵阳各月出现暴雨的频率 (%)

频 率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 年
次 数	0	0	1	9	29	45	35	16	18	8	0	0	161
占总次数%	0	0	0.6	5.6	18.0	28.0	21.7	9.9	11.2	5.0	0	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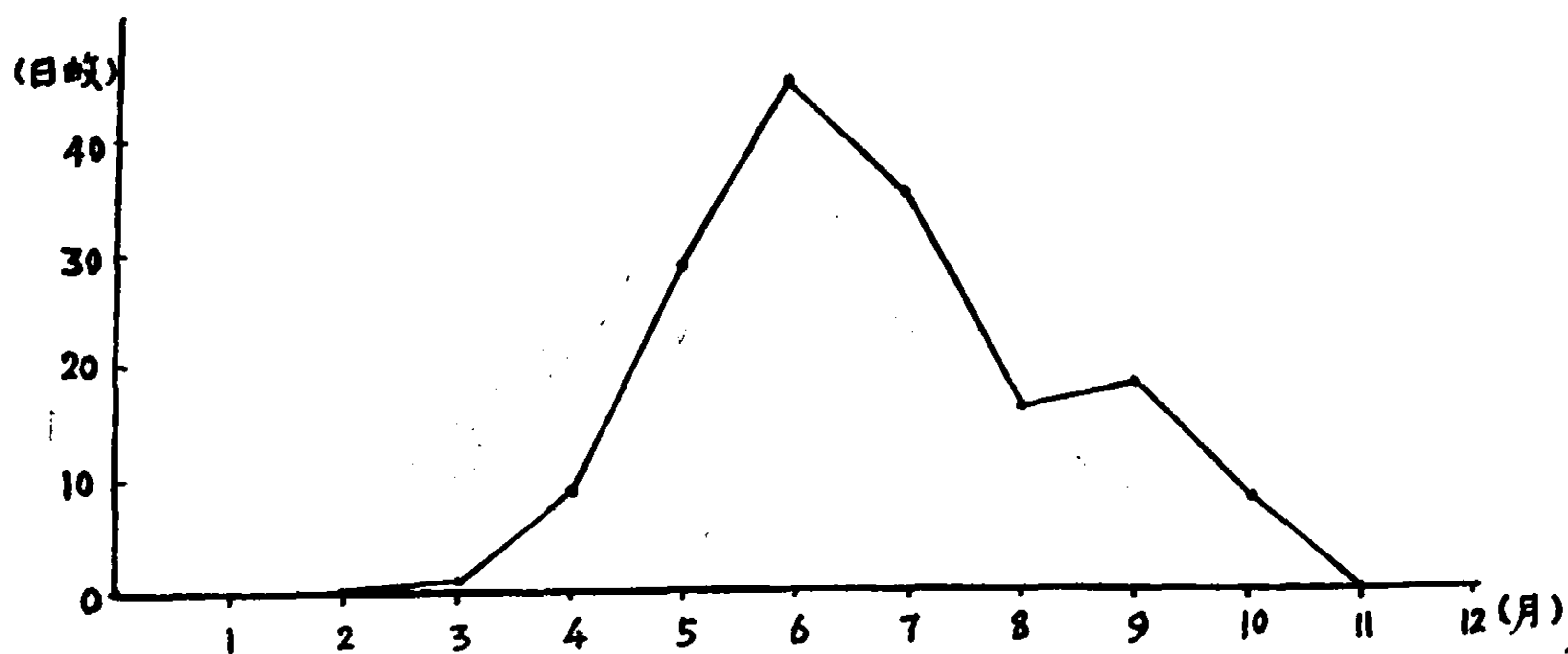


图1. 贵阳暴雨日数的月间分布曲线

若对暴雨分级，以日降水量在50~74.9毫米间的作暴雨、75~99.9毫米的为中暴雨，大于或等于100毫米的为大雨，统计自1921年至1980年贵阳六十年的逐日降水资料可知：日降水量在50~74.9毫米的暴雨累年共计127天，最多的一年有7天（1929年）；降水量在74.9~99.9毫米的中暴雨累年共计25天，最多的一年有二天（1934、1954、1960、1963等）；等于或大于100毫米的大暴雨，六十年中仅有9天，分别出现在1927、1935、1954、1956、1958、1960、1963、1970、1977等年，每年均仅出现一次。可见，贵阳的暴雨是以日降水量在50~75毫米间的暴雨为主（见表3）。

表3· 贵阳暴雨级别日数分析

	暴 雨 (50~74.9毫米)	中 暴 雨 (75~99.9毫米)	大 暴 雨 (≥100 毫 米)	总 计
日 数	127	25	9	161
占总日数的%	78.9	15.5	5.6	100

各次暴雨的降水量因月份不同而有一定差异。最大的一次暴雨降水133.9毫米（1954年5月2日），相当于贵阳累年平均的年降水量1197.2毫米的11.2%，即这一天的降水量竟达一般年份全年降水量的十分之一强。最小的一次暴雨，降水量仅55.8毫米（1970年3月31日），其它月份降水量多在80—100毫米左右（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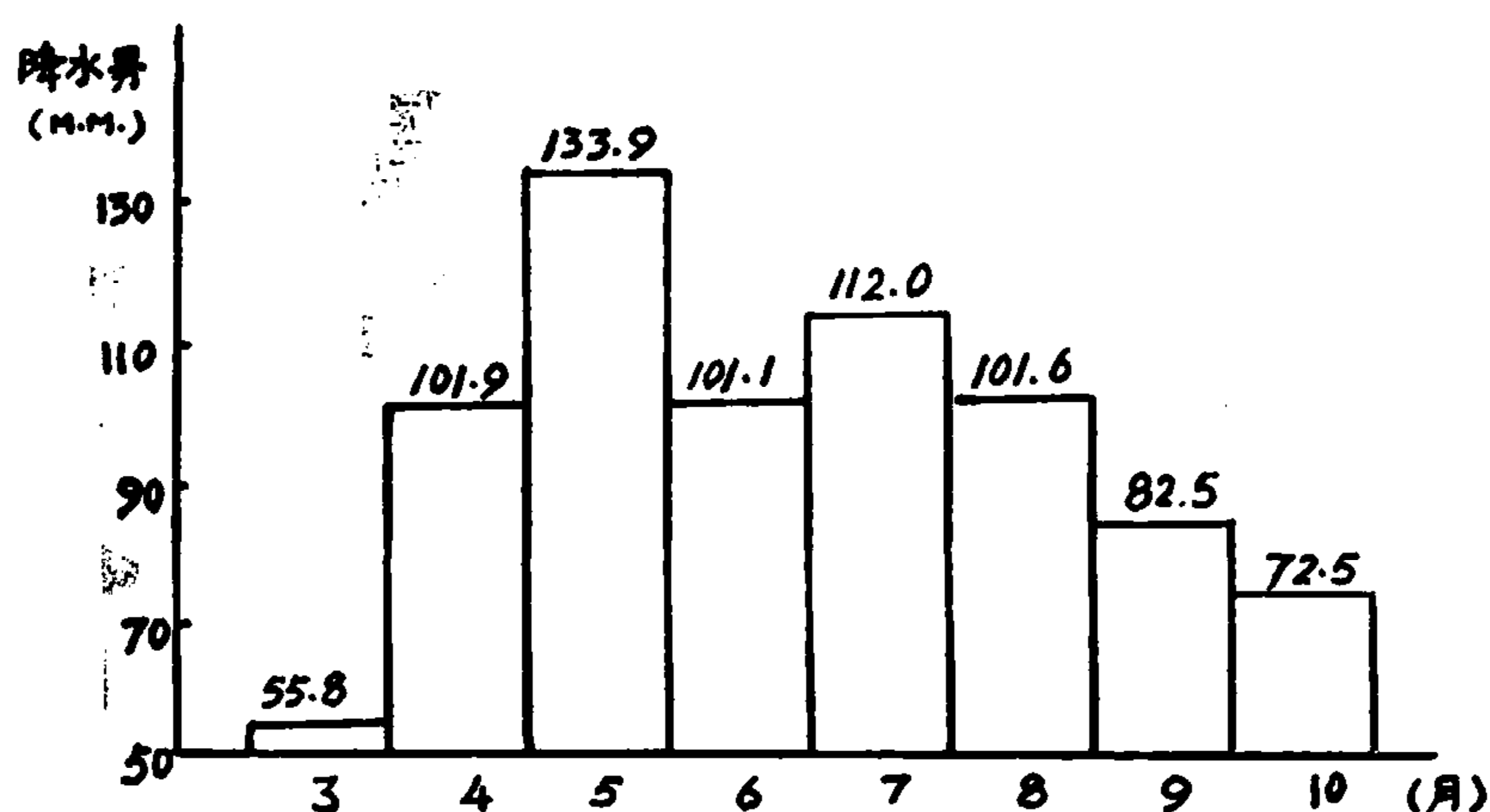


图2. 贵阳各月暴雨最大降水量

在贵阳，连续二天出现暴雨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更会造成大量降水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以致发生洪水。例如1934年6月23日至24日，连续二天暴雨，共降水119.4毫米；1945年7月4日至5日，二天共降水122.1毫米；1951年4月25日至26日，二天共降水119.6毫米；1963年7月10至11日，二天共降水178.2毫米。尤其是1954年6月26日至27日，二天共降水154.2毫米，这二天的降水连同本月23日的中雨（21.2毫米）、24日的暴雨（61.3毫米）及25日、28日的二次大雨（28.1毫米、28.4毫米），连续六天共降水293.2毫米，约为当年全年降水的16.7%，相当于平常年份全年降水量的24.5%。但是，由于贵阳大多数的暴雨为50—75毫米的小暴雨，加之全年降雨次数多，分布均匀，因此暴雨的次数并不与年降水量成正变联系。图3即为1971年至1980年贵阳的暴雨次数及年降水量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暴雨次数最多的1972年，其年降水量（1316.3毫米）反而没有暴雨日数较少的1976年（1353.4毫米）、1977年（1373.9毫米）多。同样，暴雨日数较多的1980年，其年雨量反而较少（见图3）。

根据贵州省可能最大暴雨编图办公室于1978年1月作的《贵州省暴雨普查资料》，贵阳（不包括花溪、乌当）从1952年至1974年的二十三年中，出现暴雨中心在贵阳的暴雨（日降水量 ≥ 80 毫米）仅有二次，且雨区范围均仅局限于贵阳市区。除此之外，暴雨中心在贵阳以外，但雨区范围却包括贵阳的暴雨还有12次。各次暴雨发生的时间、位置、雨量及雨区范围如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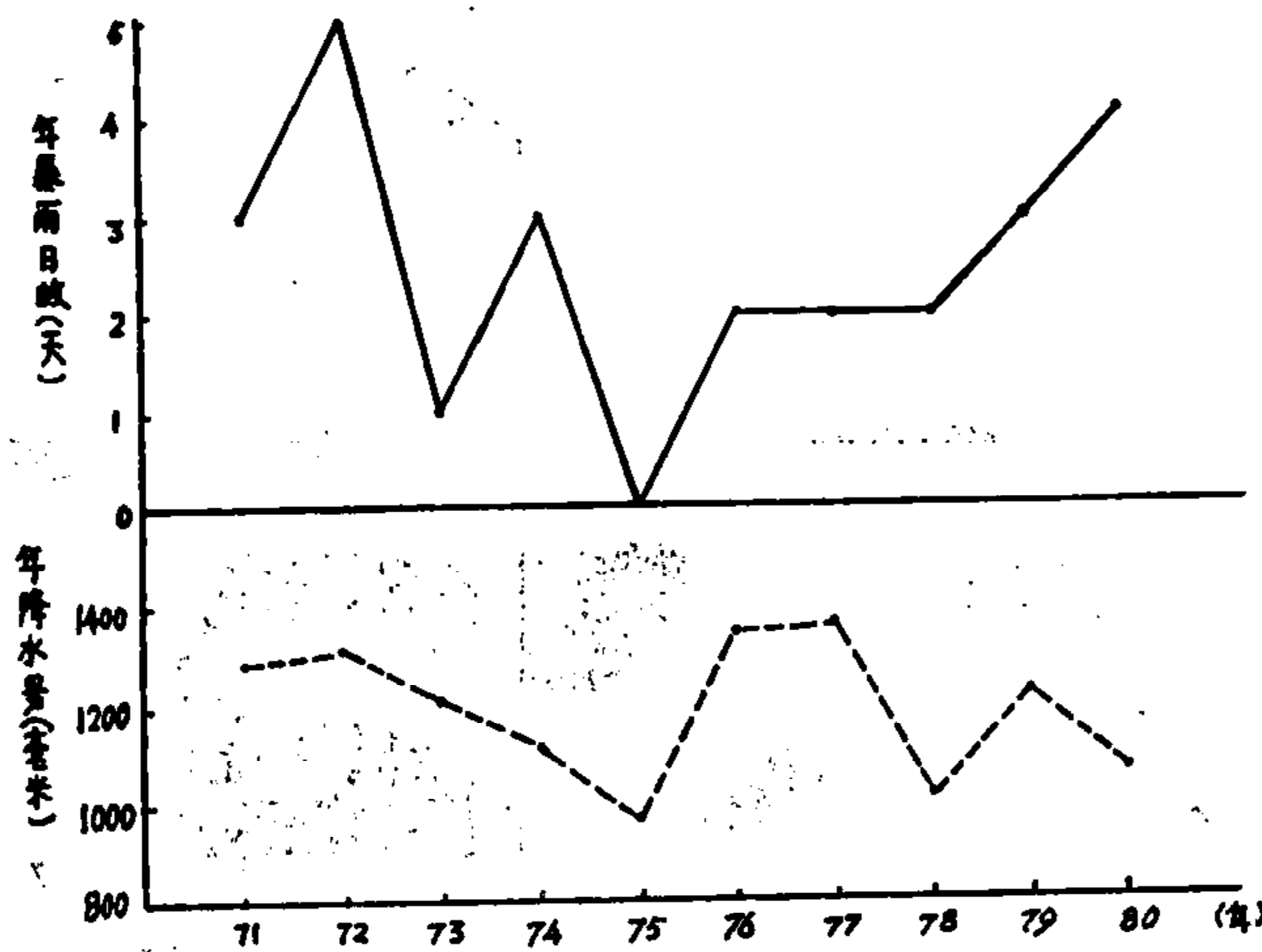


图3. 贵阳1971—1980年年降水与年暴雨日数变化曲线

表4·

贵阳暴雨普查资料 (1952—1974)

暴 雨 中 心							雨 区 范 围 (≥80毫米 站名)
日 期			位 置			日雨量 (毫米)	
年	月	日	县、市	社	村		
1953	5	10	贵阳		翠薇路	102.3	贵阳
1954	5	2	麻江	城关	西山坡	171.5	麻江、清镇、贵阳、龙里
	6	26	从江	城关	公安坡	181.3	从江、三都、贵阳、贵定
	7	25	普定		城 关	168.6	普定、思南、平坝、凤冈、龙里、贵定、贵阳、桐梓、遵义、大蒙古、正安、新桥
1956	7	25	贵阳		翠薇路	101.4	贵阳
1958	4	8	花溪		松柏山	115.7	松柏山、贵阳
1960	6	20	清镇	城关	永光北路	107.1	清镇、五里桥、普定、平坝、镇宁、贵阳、黄平
	6	21	安顺	旧州	平 寨	184.5	平寨、贵阳、安顺、镇宁、关岭、高旺寨
1962	6	29	罗甸	城关		106.6	罗甸、关岭、红枫、贵阳、紫云、清镇、兴仁、普安
1963	7	10	清镇		红枫湖	255.4	红枫、清镇、麦翁、百花、麦家桥、金华、寨英、沙子哨、徐家渡、田坝、煎茶溪、沿河、德江、松桃、余庆、凤冈、修文电厂、红板桥、狮子石、白家村、花溪、湖潮、阿哈、贵阳、聚凤、官坝、福泉、安顺、普定、瓮安、都匀、务川
1963	7	30	都匀		文峰塔	129.3	文峰塔、缠溪、福泉、桃映、寨英、沿河、都匀、麻江、望谟、蔗香、八茂三堡、贵阳、松桃、雷山、罗甸、丹寨册亨
1970	7	11	剑河	白道	白 道	298.8	南花、平寨、下司、宣威、白道、摆金、杨勇关、凯里、雷山、夏官屯、黄猫村、老郎寨、松柏山、湖潮、谷江、阿哈、朗里、文峰塔、王司、交密、湾水、南哨、新柳、启蒙、摆所、青岩、惠水、平湖、永乐、尚重、色边、大湾、都匀、台江、剑河、麻江、丹寨、平塘、长顺、马场、活龙、红枫、金华、林卡、王宽、二官寨、西江、八茂、桂家湖、安顺、鸡场、兔场、瑞里、罗甸、三穗、贵阳
	9	18	安顺		北门外	171.5	安顺、普定、落别、二官寨、阿哈、王宽、七眼桥、马场、黄猫村、乐平、麦翁、平寨、老郎寨、站街、金华、湖潮、桂家湖、息烽、平坝、贵阳、六枝
1972	10	8	榕江	平江	平 江	129.2	榕江、丹寨、麻江、都匀、龙里、贵阳

(三)

从贵阳暴雨的上述历史记载及近六十年气象记录分析，可以看出贵阳的暴雨有以下特点：在一年内发生暴雨的次数不多；暴雨发生的时间以夏季最为集中；每一次暴雨的降水量不很大（不超过140毫米）。因此贵阳的洪水灾害多数情况并不是直接由一次暴雨形成，而往往是由于大雨连绵、淫雨成灾。

大坝子高家花园(怡园)

——解放前中共贵州省工委的一个重要活动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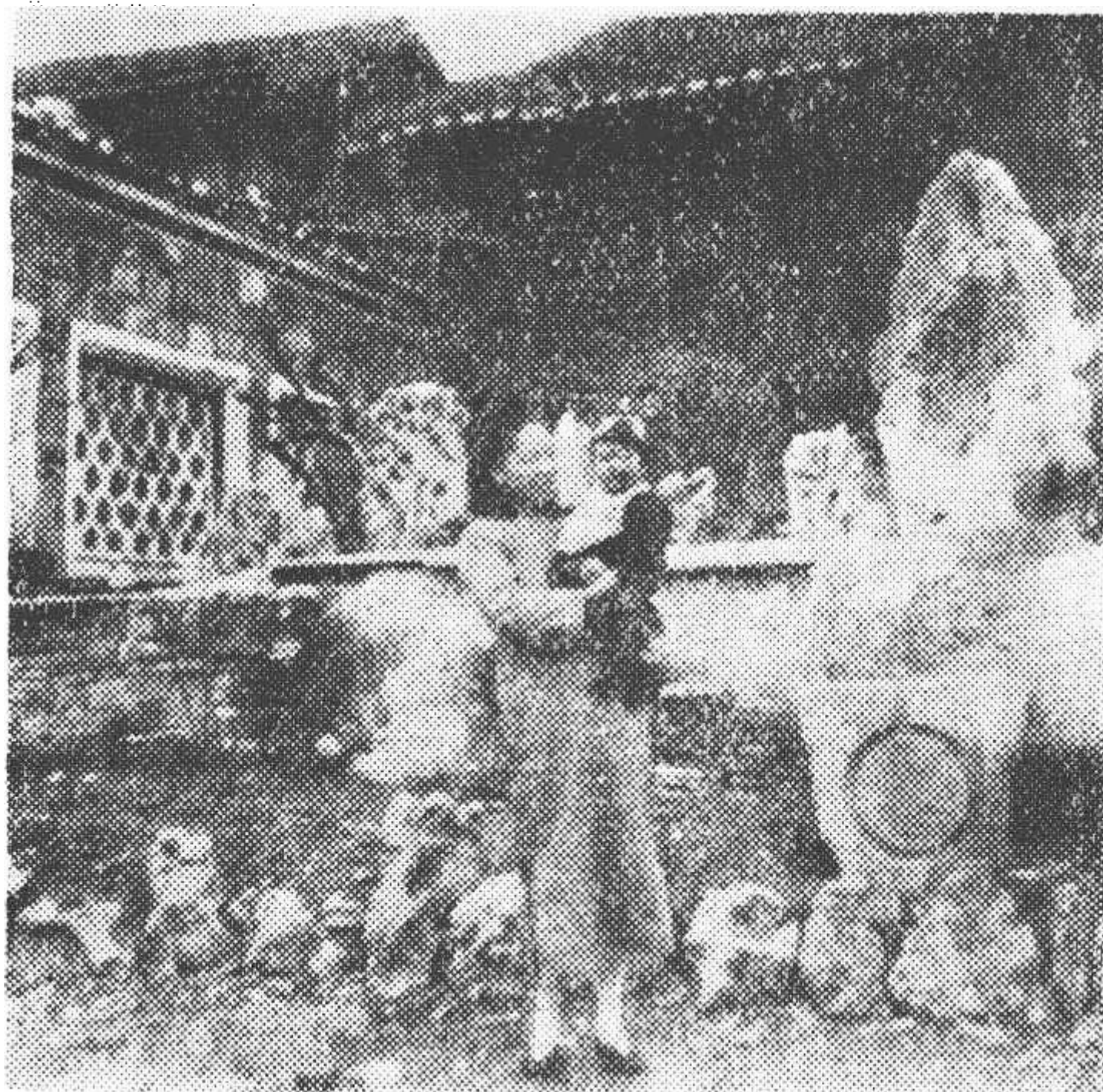
尹克恂

(一)

大坝子高家，是解放前贵阳有名的封建大家族之一。

大坝子是这一带地方的泛称，高家公馆在这里的文笔街，这条街左边大部分房屋均属高家所有，右边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围墙。高家是清代乾隆年间从红边北衙寨（贵阳北郊）搬到大坝子的。嘉庆年间，这个家族的成员高庭瑶，曾任肇庆府和广州府知府，咸丰、道光年间，他的后人又作过三任知府。俗话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高家把几代宦囊所积，建成了这座包括三个大朝门，六个门牌号码的大公馆。正门在文笔街，后门在忠烈街，左邻

右图系高家花园怡怡楼，楼上楼下都是藏书室。秦天真同志曾在楼上左屋隐蔽。隔墙系楼外楼，是地下党经常聚会的地方。



邬家巷，右抵文明路，前后六进，大小房屋一百多间，院落十多个。此外，高家在北衙十三寨有年收租谷一千二百担（约二十万斤）的田产。这一切为这个封建家族长期聚族而居，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为了巩固封建家族制度，高家的祖先把不许分家、不许变卖、典当田房、公产公用等订为家规，世代遵守。到了民国初年，高家生齿日繁，田产收入已无法把所有家族成员生活全部包下来，加上迁居省外者日众，遂改为计口授食。办法是：不分男女，出生后第三年每人每年都由公上发给稻谷十担（一千六百斤），孤寡加倍。女性出嫁后停止，如境遇不好，仍给予一定补助。子女入学，学费由公上支付，供至高中毕业。毕业后生活自己负责，收入各人私有，住房由公上统一安排。全部家产推辈数最高的长辈一人负责掌管。

（二）

在爱国民主运动和马列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这个封建家族从二十年代起开始发生变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亟，国民党当局节节后退。广大青年学生为救亡图存，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贵州自不例外。省立一中、女师、男师等校学生，组织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开展救亡活动。当时在一中（贵阳中学）读书的高言志，就和省立高中的同学秦天真、丁树奇等积极参加了救国团活动。

一九三三年，中共党员林青、缪正元从上海回到贵州开展建党工作。一九三四年，林、缪两同志和秦天真、熊蕴竹、肖世铤、葛发祥等同志，从毕节来到贵阳，和高言志、尹素坚等取得联系，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林、秦二同志来到贵阳就隐蔽在高家花园楼外楼，这是以高家为党的一个活动基地的开始。这年九月，他们在高公馆召开了一次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并部署工作，确定林青到榕江，缪正元、李余生到安顺，高言志到三合（三都），分头联络进步青年，为建党工作打基础。这是贵州地下党组建省工委前，在高家花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不久，红军长征过遵义，林青同志到遵义向党中央负责地方工作部的领导同志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的革命工作情况后，经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高言志的革命行动，打开了高家封建堡垒的缺口。高言志入党后，他的堂叔高昌谋、堂兄弟高言书、高言善、姑姑高旭，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堂叔高昌华、胞弟高言诗，也参与联络、送信、掩护等活动。堂叔高明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高言诗还负责为隐蔽在花园里的同志送饭。高昌华以后在广西梧州大学建立了一个联络站。

（三）

省工委成立后，高公馆是工委负责同志经常活动和隐蔽的地点，他们利用这个地方同外

县、外省的同志联系。思南的肖次瞻、肖维亮、遵义的石果、湄潭的乔光鉴都曾在高家花园向省工委汇报工作。从武汉来的陈豹隐和交通大学的吴功伟等同志，曾在这里同省工委负责人见面。

这里又是一些重要会议的召集地点。一九三七年六月，全国“学联”杨蕴清同志从北平辗转来到贵阳，省工委委员李策介绍他和学生中的党员陶信镛、乐恭彦见面后，在高家花园楼外楼召开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杨蕴清介绍北平“一二·九”运动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号召贵州学生组织起来。这次集会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前奏。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学联”的领导骨干，制造了震动山城的“二·一九”事件。当晚，李策同志又在高公馆楼外楼召开各校中共支部负责人会议，商论对策和营救办法。一九三八年中，由谢凡生、蒋蔼如负责联络的贵阳社会科学座谈会，在楼外楼召开过一次大会，到会人士多达六十余位，进步教师刘方岳、赵毓祥、高滔、郭一岑、吴澄华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许多爱国青年经过考验，在高家花园举行入党宣誓，并经常在这里过小组生活。如女中支部的华丹鹑（华纯）、陈胤孙、陶祖潜经高旭同志介绍入党，在楼外楼举行宣誓仪式，监誓人熊蕴竹。

高公馆又是党的文件、宣传品如传单等的印制处和进步书籍收藏处。花园里的怡怡楼是个大藏书室，楼上楼下书柜贮藏着五万册左右古籍，这些无人翻阅的书柜，成了保存党内文件、书刊的好地方。文件、传单的刻印工作也曾在这里进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为什么中共贵州省工委在高家花园的这些活动，能长期继续而不被反动派查觉呢？这除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同志们高度的警惕性与勇敢机智外，高公馆特殊而复杂的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深宅大院，大小一百多间房子，走廊回合，通道纵横，不熟悉的人进去会迷路，而熟悉者则便于转移，这无疑很有利于进行革命活动。其次，高公馆人口众多，全院一百四十多人，抗战开始后，旅外家族成员及亲友来筑住在这里的也不少，每天各种不同身份的人进进出出，各房有各房的客人，有的相识，有的不相识，客观上对党的活动起了掩护作用，这也是个原因。另外，高府老一辈不少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与上层官僚、社会名流、工商钜子等均有交往，特务慑于声势，不敢轻举妄动，这又是一个原因。就高氏家族来说，封建道德中的“亲亲之义”在这个家族中还能暂时维系人心，在地下党同志长期活动中，高家人尚未发现过卖亲救荣去告密的人，或与特务勾结的人。虽然家族中多数人不赞成或害怕革命，但却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对子侄辈的事从不加以过问干扰，这也是一个因素。

到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于崩溃，贵阳已面临解放的大好形势。反动派不甘

心灭亡，妄图最后挣扎，特务魔手终于伸进了高家花园。一九四九年七月，高言善同志被捕，并在解放前夕（十一月十一日）光荣牺牲。

高家花园，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记载了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它将永远保留在许多革命者的美好记忆中。现贵州省人民政府已决定将大坝子高家花园作为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基督教贵阳中华圣公会史略

杜 光 炎

圣公会，基督教新教（注一）主要宗派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格兰。（圣公会，亦名“安立甘宗”、“安立甘教会”。安立甘为英文AngLican的音译，意为“英格兰的”，因圣公会起源于英格兰，故名。）初，英国教会从属于罗马教廷。罗马教皇不仅控制英国的宗教事务，而且干预英国的国家事务，日益引起英国君主、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英王亨利八世，以教皇不准他废黜皇后、离婚重娶为导因，于1533年宣布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贡金；又于1534年促使国会通过法案，规定英国教会不再受治于教皇，而以英王为教会最高首脑，并将英格兰圣公会定为国教。圣公会自谓它与罗马教会和东正教会同是古老教会，赞成宗教改革运动，只承认罗马主教是世界众主教之一，而不承认其为普世教会的最高领袖。鸦片战争后，从英国、美国、加拿大传入中国。

贵阳中华圣公会，始创于一九三八年，创办人黄奎元。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严重失利阶段，南京沦陷，武汉告急，华东、华中一些机关、团体、医院、学校以及避难、逃难人员大批涌到西南，圣公会也在这股横流中出现于贵阳市。黄奎元，安徽太湖人，先后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和美国费城道学院，由中华圣公会皖赣教区按立（教会授圣职典礼）为会长。时在南昌办“益群社”（注二），疏散到武汉，接受中华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孟良佐（美籍）的差派，到贵阳创办圣公会。

贵阳圣公会成立后，划归圣公会云贵分教区管辖，云贵分教区从属于英国圣公会港粤教区。港粤教区主教英人何明华，教区办事处（香港称“会督府”）在香港。云贵分教区主教